

# 军民齐心解放大武汉

■王凤春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第118师率先从刘家庙进入汉口城区。5月17日,第40军第153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同日,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至此,武汉全部解放。武汉是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为武昌(今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汉口(今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汉阳(今汉阳区)三座重镇的合称。清末以来,武汉三镇工商业发达,生产实力雄厚,高等学校云集。正因如此,我军能否迅速、完好地解放这座华中第一大城市,其意义极为深远。武汉三镇的解放既没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没有经过和平谈判,而是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军仓促撤退,加上城市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斗争与张轸率部起义的紧密配合,多重合力共同作用打赢的一场战斗。



武汉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武汉三镇旧照。

洞察敌意合围布势,迫使放弃固守幻想。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随后,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先后解放南京、杭州、南昌等地。至此,整个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大解放区连成一片。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萧克,指出“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并指示第四野战军主力由华北南下提前过江。

第四野战军依照中央军委“先头先渡”的作战方针,先遣兵团约12万人兵分三路向武汉挺进,矛头指向武汉三镇。第40军夺取孝感后由团风至漳源河口渡江,直逼汉口;第43军由漳源口至武穴以东之龙坪段渡江,肃清团风至武穴段长江北岸的守军后包抄武昌;江汉军区负责清除汉阳西、北外围敌军。第四野战军与江汉军区通过从武汉的东、北、西三面合围布势,向国民党守军施加军事压力。白崇禧“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幻想就此破灭,唯恐被聚歼在武汉,遂改变固守武汉的计划。他命令武汉地区的部队收缩防线,主力部队逐次向江南湘赣边境及南浦线撤退,武汉三镇由国民党军第58军担任城防。

战场起义里应外合,围三阙一乱敌计划。在解放军三面合围、兵临城下的巨大压力下,白崇禧决定弃守武汉,乘飞机仓皇逃走。他一边命令部队迅速南撤,同时破坏道路、桥梁,抢掠物资,还扬言要炸掉华中这个最大的工业城市;一边展开城市封锁,企图遮蔽其主力部队陆续南撤的信息。面对白崇禧的险恶企图,我军围城部队没有轻易行动。被我党感召的国民党军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在湖北贺胜桥、金口起义。张轸起义,彻底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对动摇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起到一定作用。第四野战军与张轸部里应外合,全盘掌握了武汉守军的撤离计划和白崇禧企图破坏武汉城市重要设施的阴谋。与此同时,为使武汉免遭国民党军破坏,中央军委与白崇禧代表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侵占,以利和平接收,同时电令前线第四野战军派人与国民党守军联络。第

四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暂不围歼据守武汉的国民党军队,而是采取围三阙一的办法,放开一条口子给白崇禧部南撤,力求实现兵不血刃完整接管武汉的作战目标。

积极贯彻群众路线,多重合力共同作用。虽然黎明的曙光已划破天际,但武汉三镇的黑暗并没有完全褪去。针对白崇禧部在撤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爆炸、大破坏和打砸抢杀等混乱局面,中央军委决定抓住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短暂的“真空期”,迅速发动潜伏在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部行动起来,动员当地广大民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开展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做好解放武汉的思想舆论准备。发动中共地下组织、武汉市委、解放区各级城工部人员积极开辟“第二战线”,控制《湖北日报》《武汉日报》等报刊,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八项纪律。利用电台、广播等媒介,揭露国民党部分官员的丑恶行径,对国民党官员进行劝说,最终使国民党留守人员弃暗投明,放弃炸城阴谋。另一方面,广泛动员开展调查研究,为接管城市做好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号召下,武汉各界一呼百应,军、民、工、学、商多条战线齐心协力,对武汉工厂、机关、学校、金融机构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了解人员、资产、房产、地产、税收等各方面情况,为全面接管武汉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依据。最终,在多重合力共同作用下,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从军事意义上看,解放武汉三镇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人民解放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范例。此战进一步击溃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的信心,为我军向长江以南继续进军塑造良好的战略形势,也为加速中南地区和大西南的解放奠定坚实基础。从全国解放的战略意义上看,在武汉实行了不同于北平、天津的解放模式,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指挥艺术的完整诠释。“武汉模式”创造了一种解放大城市的新模式。

## 史说新语

## 新渔阳里6号：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

■郑大壮

上海市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上海市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两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诞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最早,后又积极指导其他地方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聆听新青年、新事业、新渔阳里交织的时代之歌。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极大鼓舞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怀揣崇高理想,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当时定名为共产党。8月,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最后定名为共产党。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后,进一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的宣言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为团结更多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的后备力量,陈独秀决定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共产主义预备校。1920年8月22日,经陈独秀倡导,俞秀松、施存统、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人,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宣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所以将团中央机关办公地点选在这里,是因为它与老渔阳里2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有一条弄堂贯通,便于往来活动。此后,渔阳里街区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历史见证地。

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又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校形式掩护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其目的是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任俄文教员,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担任日文、法文和英文教员。当年,楼下客堂为教室,教室后是厨房和餐厅。二楼厢房是学员宿舍,客堂为团中央机关办公室。为避免外界怀疑,外国语学社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向外界证明这里仅作为外语培训学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吸收20多名新团员。他们积极参加革命

活动,帮助工人群众建立基层工会组织。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的20多名学员分3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可以说,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我党第一个培养青年政治和业务骨干的学校,即团校的早期雏形。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引领和感召下,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队伍逐步壮大,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下设秘书、组织、教育、调查、宣传、编辑、联络和图书8个分处,除日常工作外,还要领导和协调地方团组织。

由于各种原因,1921年5月前后,上海及一些地方的团组织停止活动。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一大决

定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纳优秀成员。8月,张太雷等人从俄国回到上海,被指派负责恢复和重整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及各项决议。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成为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发挥先锋作用,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发展进入崭新阶段,新渔阳里6号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1957年,上海市将淮海中路567弄6号团中央机关旧址按原貌进行恢复。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位于这里的团中央机关旧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对团中央机关旧址进行全面整修,并成立旧址纪念馆。2004年4月26日,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石库门建筑,向参观者诉说渔阳里的故事,进一步发挥宣传教育阵地作用,持续焕发百年建筑的不朽青春。

## 链接历史

## 明清兵学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对“富强”的认识逐渐转变,他们意识到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推行洋务运动“求强”“求富”,其国防思想在忧患意识、战略判断和发展路径选择上均有所变化。

### 求强:面对现实的压迫

中国近代国防建设,首先关注的就是“求富”“求强”,但到底是先“求富”,还是先“求强”,实则很需要战略眼光。考虑到晚清局势,“求强”大概是一种本能选择。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派的思路一度非常直接且清晰:中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坚船利炮,以此来抗击列强的侵略行径。“师夷长技”就是发展军工,大量建造利器,以利器求得“自强”,进而求得“自立”,避免被西方列强欺凌。他们眼中的利器,以先进火炮和远洋舰船为代表。晚清时期致力发展的,也正是这两种武器。

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看法都基本相同。曾国藩说:“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宗棠则进一步认识到“洋人嗜利,用于出售之舰船技术未必新、质量未必佳,若依赖进口,仍将为人所制”,他积极推动兵工自主制造,将“师夷长技”逐步落到实处。曾对洋务派给予大力支持,对利器充满热切期盼,他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清廷以“求强”为宗旨的军工制造,获得阶段性成果。

### 求富:筑牢国防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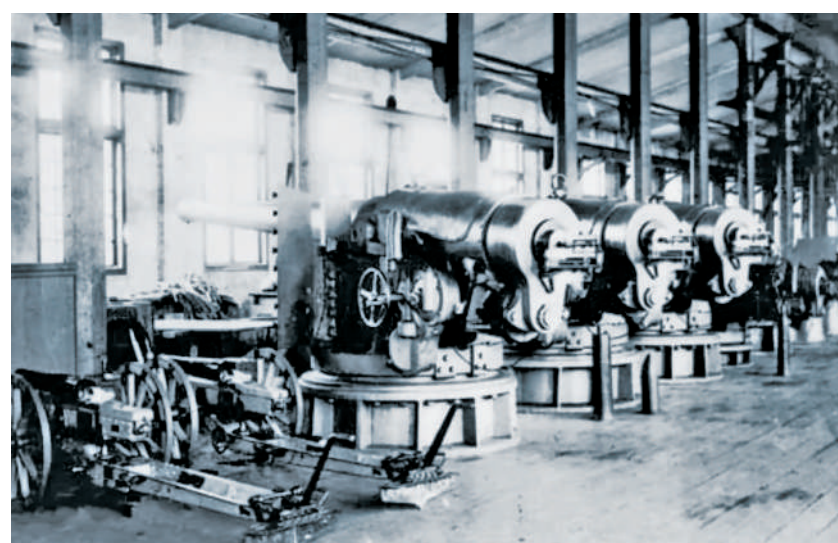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指出了战争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给物资和财产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因此,《管子》有云:“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殫;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基于这层考虑,孙子强调战争发起前,需要考虑“千里馈粮”和“内外之费,宾客之费,胶漆之材,车甲之奉”等,高度重视战争准备工作,需要积累社会财富。先秦时期法家“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的观点得到推广,秦国主张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由此取得统一天下的功业。

与古代兵家的主张有所不同,近代中国不少官员学者不只重视农业,同时逐渐重视起商业,试图由此求得富强。曾国藩最早提出“商战”这一概念,强调西方侵略者背后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指出“商战”是西方列强的国策,“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曾多次出使欧洲,并担任过曾国藩幕僚的郭嵩焘,考虑得更加深远。他将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归于政教,其次是商贾,再次才是洋务运动孜孜以求的利器。但这些主张,甚至超出洋务派当时的认知水平,甚至危及朝廷统治基础,不可能为当权派所接受。

王韬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民穷财尽”,就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得到重视。如果模仿西方国家,加快商品流通,打破闭关而治的模式,便可以迅速改变形势。因为发展工商业,既可以发展和保护中国传统农业和丝、茶业,又可以扩大贩运之利,带动货物流通,并且有效抵制外国商品的大量侵入。洋务派在与西方交涉中感受到西方的经济侵略,于是开办轮船招商局,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开展外洋贸易为“直捣中坚之策”;“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筹办织布局,“自护其工商之利,以利权”。他们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提高生产力,提升国民经济以抵抗外国侵略。

### 求新:迈向近代的观念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认为国内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并上下一心,对外才能治理武备,确保战争取得胜利。自先秦时期就已形



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景。

# 近代国防思想的初步形成

■徐寅熊剑平

成朴素的富国强兵思想,高度重视国防建设。

中国传统富国强兵理论,以求富为根基,再致力于军备。农业自古是经济命脉,也是国防基础。受“重农抑商”、以发展农业为“务本”之举等观念影响,古代兵家几乎一致主张寓兵于农,兵农结合。晚清时期,保守派充分吸收这一思想,认为侧重发展农业,便可驱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反对洋务派兴办军工,坚信中国根本不需要引进西方包括军工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因此,当时若要建构新的富国强兵理论,就必须重视“耕战”“商战”“学战”之间的联系,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

近代官员学者的国防观念,实为一步步发展变化。起初,他们只是单纯追求坚船利炮,提倡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后发展为学习其制造方法,改而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再发展到羡慕西方经济模式,试图以振兴工商业来提振国民经济,提升国防水平。然而,他们对政体并不愿意进行讨论,也不敢有所触及。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学富强之术”,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成为洋务派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郭嵩焘思想过于超前,已超越洋务派所能接受的范围,只能暂时被陋习所掩埋。大家拒绝郭嵩焘关于重商和“本末”方面的论断,采取“中体西用”模式,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政治空间内求变通、求生存、求发展。

总体来看,晚清求富求强的革新运动,虽说实际成效不大,但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为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形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指出,只有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才能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为此,他一面呼吁“铁血主义”,一面期盼“尚武之国民”,认为除此则“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西方近代国防思想被引进中国之后,受到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促进学界尤其是军事理论家的反思,以“求富”“求强”为核心要义的近代国防思想得以初步形成。